

晚霞隨筆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 盛祖嘉 著

晚霞隨筆

盛祖嘉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霞随笔 / 盛祖嘉著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309 - 06900 - 6

I. 晚… II. 盛…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4497 号

晚霞随笔

盛祖嘉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范文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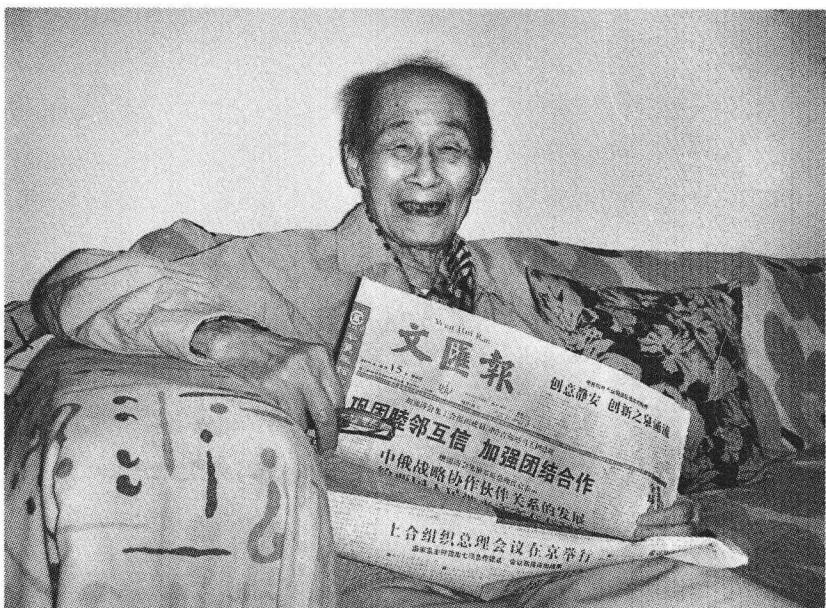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33 千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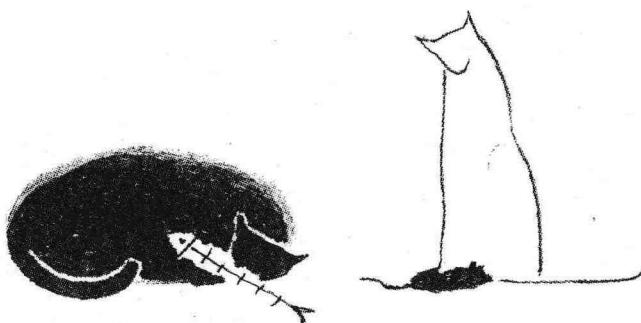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6900 - 6 / I · 517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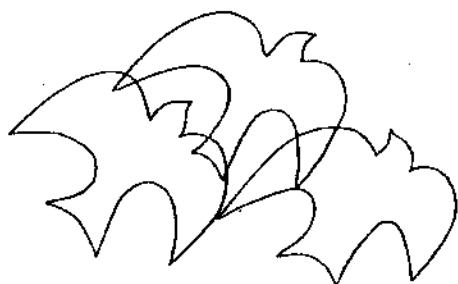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王荣樑摄于2009年秋



葉道樂榆晚
為霞尚隔天



前 言 ...

1990年冬，复旦大学生物系88届和89届的六名学生来到我家，带来一本文艺日记本送给我。我不记日记，这本日记本躺在桌上多年。1998年我因患癌症住院。第二年出院后便陆续用它写些短文，于2004年结集成书，自费印了若干本分赠亲友。文艺日记本的扉页上有他们书写的两句诗“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就把文集取名《晚霞随笔》。此后九年里又陆续写了一些，并从前书中选取若干篇合成本书，书名照旧，扉页上也仍旧复印上他们书写的这两句诗。

目
录

五怪家庭	1
我的学术生涯	8
科学基金文化之我见	14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回顾	19
思维传感中“屏幕效应”现象的分析	26
论特异功能研究	34
弄虚作假和急功近利	40
再论太空育种	46
顶天立地与两头够不上——大科学与小科学	51
《蜜蜂,它们的视觉、嗅觉、味觉和语言》一书的 译者的话	56
唐家祠堂	58
追思恩师谈家桢	63
治标与治本	67
假如我是人民代表	69
医疗文化指数	73
多难兴邦	75
饮食文化,东方和西方	77
忆巴黎	85
琴棋书画——随笔四则	87

- 102 评蒋孔阳著《美学新论》
107 论漫画兼论丰子恺的漫画
112 话幽默,说鲁迅与林语堂之争
115 农民画和女性画
118 重建雷峰塔
120 《阅微草堂笔记》译评两则
127 缘
128 集邮
131 记两次西湖一日之游
134 最好不要轻易去
138 喝酒和吃酒
143 告别童年
146 有人要送我一本《圣经》
149 遗嘱
151 悼亡妻
154 病榻追忆(沈仁权)
162 往事似烟 人生如歌(沈仁权)
166 悼亡兄沈仁湘(沈仁权)

五怪家庭…

2002年4月22日的《新民晚报》上登载着一篇《四位教授和一位保姆》，这里面的楔子一段中写着这样几句话：“他们一家人工作勤恳踏实，几十年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学生中相当多的人已是国内或国外的教授。然而，他们都平易近人，邻里关系好，多年来被评为市和区的五好家庭，2001年被评为全国五好标兵十户之一。”

当然，我是知情人。其实说他们是五好家庭，不如说是五怪家庭。

第一怪是88岁的老太沈仁权。这几天听了不少有关贪污分子上海原第一把手陈良宇的小道新闻后，老太深感内疚。难道因为她也贪污吗？不，正好相反，她因为在大约60年前做了一件“反贪”的事而后悔。那时她大学刚毕业，留校当助教。由于看到化学系同系的兼系主任的教授在教职工食堂里包两份菜却拿三份饭回家便站出来“揭发”，终于自食其果，第二年便拿不到聘书。抗日战争年代里大后方的教授过的是怎样的生活！那位教授无非占了些小便宜，对比今天那些养尊处优的贪官污吏，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吗？为此老太想起来深感对不起自己的老师。

年轻时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脾气到老也不改。再说一个“笑话”，那也已经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了。有一次老太独自上街，在电车里看到一个解放军穿着军装却没有扣上风纪扣，于是便要他扣上。

他听了唯唯称是，立即扣上。回家后老太笑说他大概以为我是个什么首长了。解放军当然怕首长，可是如果碰到小流氓那便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以后老太独自上街的话，我总要提醒她别和小流氓评理，背上挨一刀不合算。

一转眼又是几十年了，老太还是看不顺眼的事都要管。物业账目不清要管；人行道上骑车要管；复旦大学校门口那块“自行车下车推行”的牌子是在她的建议下树立起来的；复旦小学门前那条马路改为单行道是经她一再呼吁，最后在《解放日报》上登出“复旦小学门前太乱，老教授来电呼吁解决”这一报道后才得以落实。

老太在 20 世纪 40 年代在美国一面工作，一面夜校进修，1951 年回国。那时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回国后一般都被聘为副教授，可是有些人会讨价还价，不聘为教授便不干。老太回国后也被浙江大学聘为副教授，然而她却认为自己没有博士学位所以不该聘为副教授。经过“讨价还价”，终于以讲师职称应聘。这不是怪事吗？

《新民晚报》那文章的楔子中说“邻里关系好”，其实同事关系也不坏。在复旦大学早期几年里，经济上有困难的同事来敲我家门的人并非个别，在较长时期中给以帮助的亲戚朋友也有四五人，然而老太自己在物质生活上却近乎苛刻，就连老头都要称她为“砂锅党”，意思是只要一只砂锅就可以过日子，这不怪吗？

现在再说老头，那就是我自己，也有些怪。先从小事说起，他怕吃饭时别人向他碗里夹菜，他怕出游时别人定要为他照相。还有一怪是在一段时间里口袋里带着粉笔，看到地上有痰迹便用粉笔在它周围画上个圈。还有一次他自告奋勇在大礼堂上向学生们讲“大学生应是精神文明的倡导者”，引得管礼堂的工友好奇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没有看到过”。是呀，不是做思想工作的人，他怎么会认识呢，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

“文化大革命”前后一段时间里他是生物系的副系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有人问他：“别人(指正主任和别的副主任)都是党员，你这副主任好当吗？”问得他哑口无言。真是惭愧，他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问题。怪不怪？

其实早已有人劝他入党了，包括校长办公室主任、系领导和一个普通党员。不过告诉你一件事，就可以知道像他这种人是否配做党员：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来到复旦大学不久的某日，一位哲学系教授(当然是党员)问他是否打算参加每周周末的政治学习，接着还补充一句说：“这当然是自愿的。”他听了便说：“既是自愿的，那我就不参加了。”好在后来还是参加了，否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肯定是一条反革命罪状，那才真成了怪事。

说了老太、老头就该说说女儿盛小禹、女婿毛裕民了。我的命是女儿救的。1998年我因前列腺癌的癌细胞扩散到全身骨骼而住院。那时医生几乎都已绝望，可是女儿心不死，她求医问药，终于两针下去便解除了疼痛，挽救了生命，再加上一些防止癌细胞扩散的药，不到一年便出院了。

许多人听说以后都认为这是奇迹，不过对于女儿来讲，这还算不得怪事。怪还怪在从此以后她通过自学竟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医生”，先是为人咨询前列腺癌，然后旁及其他癌症。校内、校外，上海、北京，都有人来“求诊”，持续到今年(2006年)年终北京还有人“求诊”。接下来她又帮人买药。如果她伸手要回扣的话，恐怕早已成了富婆了。

多年来她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中担任两门遗传工程方面的全系基础课，是两门实验课，职称是副教授。不过，历年来她的学生中不乏教授，而且上过她的课的人中在今天更有不少人是教授、主任或院长，可是她满足于当一个副教授。她常向人介绍自己说我是管

实验的。别人称她为教授时她总要补充一句：“是副教授。”

女儿好管闲事，所以母亲常说她不务正业。其实，女儿的管闲事“基因”正是母亲传给她的。女儿除了为人咨询癌症和买药以外，还常为人找工作和介绍“朋友”，所以我常戏说她的公司设三个部门：医药部、职业部和婚姻部。

再说我那女婿。“文化大革命”后正式招收的这两届学生是我生平接触到的最不一般的学生，我的女婿便是其中的一员。

2006年5月18日的《南方周末》登载着一篇《一流的学生从哪里来》。文章说一流大学需要四个一流：一流的教学设施；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接着说前面三个一流都不难办到，而最难的是一流的学生。接着就说：“我就一直怀念77级、78级那个藏龙卧虎、五花八门的校园文化。我们中间有从十万大山来的老插队；有已达十年教龄的民办老师；有乳臭未干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散步也像操正步的转业军人；有在文工团跳过芭蕾的‘白毛女’；有在塑料鞋上钉铁掌的县城干部；有在省报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臭老九’；有用小楷毛笔字抄过三遍《左传》的工人；有因偷听外国英语台而失业的青年；有因不满‘四人帮’而受过惩罚的‘思想家’；有住在高墙深院内的高干子弟；有讲‘洋泾浜’国语的归国华侨；有张口闭口《哥达纲领批判》的老高三……”作者（黄全愈，美国迈阿密大学教育管理学博士，教育学院兼职教授）认为这种多元文化才是“无价财富”。姑且抛开理论不谈，至少实际上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一个前任院长（我的女婿）、两个院士、一个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兼职教授和一个现任副校长都曾是我的77级、78级或以后的学生。

楔子里还说女婿是我的得意门生。这的确不假，在这里我只说一件鲜为人知的事。那时他大学三年级，在我的课上他就某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写了一篇论文摘要。对于其中所用到的数学我并

不完全理解,不过对于所涉及的问题我似曾相识,一查文献,发现对于这一问题已经有人作出类似解答,否则完全可以写成论文在国外的杂志上发表。在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只此一例。

大学毕业以后他又是我的博士生。名义上我指导他写博士论文,其实论文题目是他自己提出的,实验是他自己设计的,技术上靠他自己摸索前进。那时他常工作到深夜。有一次后半夜无法进门,只好翻墙头回家。

若干年后他自己的博士生和他共同发明了一项探测新基因的生物工程新技术,并且根据这一技术创建了企业。事业蒸蒸日上,在学术上和企业上都有建树。

最后轮到小外孙毛信迪了。怪就怪在这样的爹妈生下来的儿子在初中一、二年级时三门主课考试常不及格。难道他就是那么不中用吗?可是他一年级时电脑课的期终得分是90分,而且老师的评语是:“你头脑灵活,思维敏捷,接受能力强,学习认真、主动,有较高的信息素养,成绩优异。希望你继续努力,在本学科上争取更大的收获。”

这样看来,五怪中最怪的会不会是小外孙呢?可是谁知道是他怪呢,还是我们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怪。

这样五个怪人组成的当然是一个五怪家庭。这家庭首先怪在多少年来除了星期天晚上一次聚餐外很少在一起吃饭(除了两个老人外),而且按照我的不免夸张的话来讲,24小时内都有人吃饭,有人睡觉。

这一家人还挺忙的。咱们的中学生的功课当然是世界上最忙的,经常要做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才上床。管他做功课的老太便成了世界上最忙的老人之一。

女儿也忙,除了为人咨询癌症,为人买药,为人找工作或介绍朋

友和管学生的实验课以外，在实验室里拖地板、抹桌子、搬这搬那，什么都干。我有时笑对她说你做了那么多不该你做的事，就得罢免你的副教授职务。

女婿是有名的大忙人，而且似乎一天比一天忙。小外孙在小学时他星期天常带他出去玩并且顺便吃一次肯德基。现在几乎只在周末聚餐时见面，甚至聚餐时也不大见面，因为小外孙又要忙着在电脑上玩游戏了。

今年我自己也够忙的了。《微生物遗传学》第三版脱稿，翻译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在半个世纪前所写的《蜜蜂的视觉、嗅觉、味觉和语言》，还写了《五怪家庭》等一些短文。

更出奇的是老太和老头的各自已故的老爸都有些怪。巧得很，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一个学农，一个学工。还有老太的妈也称得上一怪。

老太的爸沈素生怪在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却自称胸有马列。我们留有他写的一个扇面，这上面写着：“家无汉伪，胸有马列；信仰主义，矢达目的；节衣缩食，卅年如一；今日解放，其乐无极；帝资封建，从此毁灭；自由平等，铲除阶级；生活之道，在于劳力。时在己丑四月二十七日，苏州解放，歌号数语，藉以表白既往，警惕将来云耳。素生并题。”

同样地，我们也保留我爸盛承彦（号宓衲）的一件遗墨，那是抗日战争后期他在重庆时给某报社所写的一封信：“本人不能写文章，要是说得对，贵报何妨来一篇社论。……公务人员生活困难，已到山穷水尽。……但公务人员并不都陷于生活困难之境地。……（一）利用地位兼营商业者；（二）身为公务人员而营私舞弊者；（三）为一机关或一附属之主管，一切家用开支由各该机关庶务人员代为购办设法报销者。……如能破除情面，将上文之（一）、（二）、（三）完全割除。

一方面限制物资之使用，再平允加添薪津，则一切困难均可迎刃而解。必法弊虽多，市面无超出必要之货物可购；薪津虽少，每个公务人员享受相同，方可转换空气，整饬操守。不然即使前方打胜仗，后方亦要不得了。”

将（一）、（二）、（三）完全割除，今天做到了吗？明知做不到，却要报社来一篇社论，这不怪吗？

然而，本文中唱压台戏的得数老太的妈，一个只有小学加上两年蚕桑专科学校学历的旧式女子却是一个女权主义的先驱者。限于篇幅，这里只说两件事。一是有关老太的取名。老太属“仁”字辈，然而“仁”字只用在男子的取名中，女子的取名则习惯于用“德”字代替“仁”字。老太的妈则坚持在取名上应该一视同“仁”，所以为老太取名“仁权”，非但不避讳用“仁”字，而且取名中还包含女子也要有权的意思。

第二件是有关争取女子参拜神像权的事。按照沈姓家族的不成文法，女子无权在年终参拜祖先神像。可是，老太的妈在嫁到沈家的第一年年终便联合族中的姑嫂们共同要求参拜神像。结果非但这样做了，而且从此以后改变了这一歧视女子的族规。

然则怪也有种乎。

本文写于 2006 年，第二年老太便因癌症不治归天了。呜呼，天下从此少了一怪。

2006

我的学术生涯…

我的学术生涯得从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时算起，那时我随浙江大学进行“文军长征”，从杭州出发，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和泰和、广西宜山，最后定居在贵州湄潭。抗战 8 年期间，我听了谈家桢先生的遗传学课，在他的指导下做毕业论文，在较长时间里当他的助教，在他的指导下进行果蝇遗传学研究，并有机会读遍他的藏书，如摩尔根的《基因论》、杜布赞斯基的《遗传学和物种起源》、哥尔舒密特的《生理遗传学》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谈先生推荐于 1946 年去美国师从杜布赞斯基攻读博士学位。鉴于当时微生物遗传学的兴起，便从果蝇遗传学研究转向脉孢菌遗传学研究。获博士学位后于 1951 年回国，在复旦大学生物系任教，主要讲授微生物遗传学课程。

1 教 学 工 作

我的教学生涯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微生物遗传学》一书的一再修订再版和以该书的第二版作为教材在全国 10 个院校宣讲（其中三次按我们合作编写的《分子遗传学》一书的内容与沈仁权教授共同宣讲），为接踵而来的分子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研究打下了基础。

《微生物遗传学》一书在 1962 年所写的《微生物遗传学基础》的基础上于 1982 年改写而成，又于 1987 年修订再版，再版获国家教委